

翻譯與政治 有關嚴復的翻譯的幾個問題

王宏志

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

1931年12月，領導上海左翼文藝界的瞿秋白，在一封給魯迅討論翻譯的信裏把嚴復揪出來痛罵一頓：

嚴幾道的翻譯，不用說了。他是：

譯須信雅達，
文必夏殷周。

其實，他是用一個「雅」字打消了「信」和「達」。最近商務還翻印「嚴譯名著」，我不知道這是「是何居心」！這簡直是拿中國的民衆和青年來開玩笑。古文的文言怎麼能夠譯得「信」，對於現在的將來的大衆讀者，怎麼能夠「達」！¹

先不說嚴復的原意是不是要用一個「雅」字來打消「信」和「達」，瞿秋白這段話實在很有問題：他的弊病在於以自己的政治標準加於嚴復身上。我們知道，瞿秋白自中共六屆四中全會（1931年7月）被王明排斥於黨中央以外後，即把精力放在文藝界，領導「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左聯」這個組織的政治性很強，經常發動反國民黨政府的活動如遊行示威、派發傳單等。在文藝方面，他們最積極推動的是文藝大衆化運動，就是要爲知識水平較低的普羅大衆創造文學。我們這裏不去討論這做法的正確性，但問題在於我們可不可以向嚴復提出同樣的要求。在十九世紀末動筆翻譯《天演論》的嚴復，不用「古文的文言」，能用些甚麼工具？他下筆的時候，又怎麼可能會考慮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現在的將來的大衆讀者」？當時全心全意推動大衆文藝運動的瞿秋白，把幾十年前的嚴復揪出來痛罵，說他沒有「爲人民服務」，這跟1928年錢杏邨罵魯迅的阿Q早已死去的做法如出一轍，²都同樣是把自己的政治標準強加於別人身上。

當然，我們不是說談翻譯的時候不能談政治。事實上，很多人從事翻譯或討論翻

1 《關於翻譯的通信》，見《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卷4，頁372。

2 錢杏邨《死去了的阿Q時代》，載《太陽月刊》第3期；又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代文學研究室編《「革命文學」論爭資料匯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1月，頁193。

譯時都有很強烈的政治動機，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左聯」的成員——包括瞿秋白自己和魯迅——在三十年代大量翻譯蘇聯和日本左翼文學家和理論家的作品。嚴復也不例外，他從事翻譯也是緊緊扣著政治的。在這篇短文裏，我們會看看嚴復從事翻譯的政治動機，也會探討一下政治因素對他的翻譯的影響。

儘管人們今天提起嚴復這名字的時候，大都只會想起翻譯家嚴復，而忽略了他作為一個思想家、政治家在近代中國史上的影響和貢獻。其實，在翻譯和出版《天演論》前，他已經在天津《直報》上發表了很多重要論文，例如《論世變之亟》、《原強》、《原強續篇》、《辟韓》及《救亡決論》等，都是鼓吹維新變法、救亡圖強的。其後，他曾贊助梁啟超在上海創辦《時務報》，與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創辦《國聞報》，繼續宣揚維新思想。1898年，他更獲光緒召見，詢問對變法的意見。可見他跟晚清的維新派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嚴璩《侯官嚴先生年譜》說，他開始翻譯《天演論》，是在甲午之戰後（「和議始成，府君大受刺激，自是專力於翻譯著述」）。³ 在給友人張元濟的信中，嚴復清楚說出了從事翻譯的意圖：

復自客秋以來，仰觀天時，俯察人事，但覺一無可為。然終謂民智不開，則守舊、維新，兩無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與我後生英俊，洞識中西實情者日多一日，則炎黃種類未必遂至淪胥。即不幸暫被羈縻亡國，亦得有復甦之一日也。所以屏萬緣，惟以譯書自課。⁴

又說：

復今者勤苦譯書，羌無所為，不過閱同國之人於新理過於蒙昧，發願立誓，勉而為之。極知力微道遠，生事奪其時日；然使前數書得轉漢文，僕死不朽矣。⁵

說得很清楚明白，他完全是為了開通民智而從事翻譯的。這樣的翻譯動機，在晚清很流行，特別是在主張變法自強的維新派人中，便時常強調翻譯的實際作用，例如嚴復的好朋友梁啟超便說過這樣的話：

泰東西諸國，其盛強果何自耶。泰西格致性理之學，源於希臘；法律政治之學，源於羅馬。歐洲諸國各以其國之今文，譯希臘羅馬之古籍；譯成各書，立於學官，列於科目，舉國習之，得以神明其法，損益其制，故文明之效，極於

3 嚴璩《侯官嚴先生年譜》，1921年鉛印本；錄自李澤厚《論嚴復》，載《論嚴復與嚴譯名著》，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6月，頁134。

4 嚴復給張元濟信，錄自王弼《論嚴復與嚴譯名著》，同上注，頁13。

5 同上注。

今日。……大彼得躬游列國，盡收其書，譯為俄文，以教其民，俄強至今。今日本書會，凡西人致用之籍，靡不有譯本，故其變法灼見本源，一發即中，遂成雄國。⁶

而他的另一位好友林紓也有類似的說法：「吾謂欲開民智，必立學堂；學堂功緩，不如立會演說；演說又不易舉，終之唯有譯書。」

這樣的政治動機，對嚴復的翻譯造成幾方面的影響。

首先是翻譯的選材。我們知道，晚清的另一位「翻譯」家林紓，由於不懂外文，所以不能自己挑選作品來翻譯（應該指出：其實林紓一直都沒有從事翻譯，他做的只是筆錄，實際負起翻譯之責的，是他的口述合作者——用今天的話來說，他做的叫「視譯」）。但嚴復的情況卻不同，他精通外文，完全能夠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標準來選擇原著，例如 1903 年出版他所翻譯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的《羣學肄言》(*Study of Sociology*)，便是他自己在 1881 年看到這本書後，「輒歎得未曾有」、「以為其書實兼《大學》、《中庸》精義，而出之以翔實，以格致誠正為治平根本矣」，⁷ 佩服之餘而把它譯出來的。

在數目而言，嚴復的譯書並不多。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嚴譯名著叢書》，只收八種，但他挑選這八種著作來翻，政治的動機十分明顯，原因是這八種著作對當時的維新自強運動都很有幫助。即以最早出版的《原富》為例，他便說過翻譯這本書的原因，在於「其中所指斥當軸之迷謬，多吾國言財政者之所同然，所謂從其後而鞭之」，又說裏面「英法諸國舊日所用典章，多所纂引，足資考鏡」。⁸ 至於那著名的《天演論》的價值，早在出版的時候吳汝綸便指出：

蓋謂赫胥黎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衛其種族之說，其義富，其辭危，使讀焉者怵焉知變，於國論殆有助乎。⁹

又說：

執事之譯此書，蓋傷吾士之不競，懼炎黃數千年之種族，將無以自存，而惕惕焉欲進之以人治也。本執事忠憤所發，特借赫胥黎之書，用為主文譎諫之資而

6 梁啟超《論譯書》，錄自陳玉剛編《中國翻譯文學史稿》，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9年8月，頁41。

7 嚴復《譯餘贅語》，見《羣學肄言》，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年，頁2-3。

8 嚴復《譯事例言》，見《原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年，頁2-3。

9 吳汝綸《〈天演論〉序》，錄自牛仰山、孫鴻寬編《嚴復研究資料》，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0年1月，頁263。

已。¹⁰

嚴復在自序裏也說了這樣的話：

赫胥黎氏此書之旨，本以救斯賓塞任天爲治之末流，其中所論，與吾古人有甚合者，且於自強保種之事，反覆三致意焉。夏日如年，聊爲逸譯，有以多符空言，無裨實政相稽者，則固不佞所不恤也。¹¹

正如不少論者所說，嚴復的翻譯其實是具備了現實的歷史意義。既然這樣，他的譯作是否「成功」，便不在於它們可不可以做到我們今天所說的「忠實」、「通順」或其他甚麼的標準，而在於能不能夠在維新自強運動中發揮作用，也就是把一些對中國當時的改革有幫助的訊息帶給那些足以左右維新運動的讀者。

這裏觸及嚴復的讀者對象問題，由此而產生的另一個問題就是他的翻譯標準。

其實，上文已指出過，抱有類似的政治動機來從事翻譯的，不只嚴復一人，梁啟超也強調過翻譯能對中國讀者起啓蒙的作用。可是，梁啟超卻批評嚴復的翻譯過於典雅艱深，讀者不易理解明白。爲甚麼會這樣？這就是因爲他們二人所預設的讀者對象不同的緣故。

先看梁啟超對嚴復的批評：

嚴氏於西學中學皆爲我國第一流人物，此書〔《原富》〕復經數年之心力，屢易其稿，然後出世，其精善更何待言。但吾輩所猶有憾者，其文筆太務淵雅，刻意摹仿先秦文體，非多讀古書之人，一繙殆難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況此等學理邃頤之書，非以流暢之筆行之，安能使學僮受其益乎？著譯之業，將以播文明思想於國民也，非爲藏山不朽之名譽也。文人積習，吾不能爲賢者諱。¹²

很明顯，梁啟超譯文的讀者對象是一般國民以至「學僮」，而「非多讀古書之人」，所以嚴譯行文淵雅，是不適合的。對梁啟超的勸告，嚴復曾經回信答辯，最廣爲人徵引的是以下的一段話：

若徒爲近俗之辭，以取便市井鄉僻之不學，此於文界乃所謂陵遲，非革命也。且不佞之所從事者，學理邃頤之書也，非以餉學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譯正以待多讀中國古書之人。使其目未睹中國之古書，而欲稗販吾譯者，此其過在讀者，而譯者不任受責也。¹³

10 吳汝綸《答嚴幼陵丁酉二月初七日》，同上注，頁 250。

11 同上注，頁 122。

12 梁啟超《紹介新著〈原富〉》，同上注，頁 267。

13 嚴復《與梁任公論所譯〈原富〉書》，同上注，頁 124。

他接著還說他不是不希望「播文明思想於國民」，但也應該清楚分辨讀者，不可能照顧每一個不同背景的人：

夫著譯之業，何一非以播文明思想於國民？第其爲之也，功候有深淺，境地有等差，不可混而一之也。慕藏山不朽之名譽，所不必也。苟然爲之，言龐意纖，使其文之行於時，若蜉蝣旦暮之已化，此報館之文章，亦大雅之所諱也。故曰：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回於庸夫之聽。非不欲其喻諸人人也，勢不可耳。¹⁴

這段說話今天肯定會受到批判，但放在晚清的政治或思潮環境，則不能算是太不合理。嚴復清楚肯定的說出他從事翻譯，是爲了一班士大夫以至當時的統治階級。正如大陸不少文章說，嚴復畢竟只是屬於資產階級改良派，他是沒有把「普羅大眾」放在心內的。王佐良便分析過嚴復的讀者對象：

這些人足以左右大局，然而卻保守成性，對外來事物有深刻的疑懼；只是在多次敗於外夷之手以後，才勉強轉向西方，但也無非是尋求一種足以立刻解決中國的某些實際困難的速效方法而已。¹⁵

這樣的讀者對象，也影響了他的翻譯方法。要將一些可能不是馬上便可以解決中國的一些實際困難的外國的新思想傳達給這些人，其困難是可想而知的。

衆所周知，嚴復在《〈天演論〉譯例言》裏提出了「譯事三難：信、達、雅」。儘管誰也不能否認這短短的一句話對中國翻譯界產生了多麼大的影響，但也有很多人對這句話極爲不滿。由於篇幅關係，我們不可能在這裏詳細分析嚴復的意思，但毫無疑問，在「信」、「達」、「雅」三個字中，最惹人反感的應該是個「雅」字，上引瞿秋白的一段話便是一個例子。

不能否認，嚴復在《〈天演論〉譯例言》裏確曾說過翻譯時要用「漢以前字法句法」，這樣做可以「達易」，也能達到「雅」的效果。這點今天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但如果我們能從歷史的角度看這個問題，便不會覺得有甚麼不妥之處。正如沈蘇儒所說：「在他拿起《天演論》來翻譯的時候，除了『之乎者也』的古文以外，他還能有甚麼別的文字工具。」¹⁶ 這點我們在上面也簡單提過。談到古文，在清代，「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嚴復受業於吳汝綸，吳汝綸往往被稱爲桐城最後一個大家，嚴復古文深受桐城影響。桐城古文義法溯源於唐宋八大家，因此，嚴復以「漢以前字法句法」作翻譯，也

14 同上注。

15 王佐良《嚴復的用心》，載《論嚴復與嚴譯名著》，頁26。

16 沈蘇儒《論信、達、雅》，收入羅新璋《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5月，頁942。

是與桐城古文義法有關，且在當時是一個很普通的要求，根本沒有人感到有甚麼不妥。

上面說過，嚴復從事翻譯是抱有強烈的政治動機，他心中的讀者對象是一班多讀古書之人，爲了能夠取悅這些足以影響維新運動的朝廷大臣，他強調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強調「雅」的效果，便是很有必要的了。有人曾經以「苦藥」和「糖衣」的比喻來說明這問題：

但他〔嚴復〕又認識到這些書對於那些仍在中古的夢鄉裏酣睡的人是多麼難以下咽的苦藥，因此他在上面塗了糖衣，這糖衣就是士大夫們所心折的漢以前的古雅文體。雅，乃是嚴復的招徠術。¹⁷

另一方面，魯迅在三十年代曾爲嚴復這個做法作過一個解釋：

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論》，桐城氣息十足，連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搖頭晃腦的讀起來，真是音調鏗鏘，使人不自覺其頭暈。這一點竟感動了桐城派老頭子吳汝綸，不禁說是「足與周秦諸子相上下」了。

那麼，他爲甚麼要幹這一手把戲呢？答案是：那時的留學生沒有現在這麼闊氣，社會上大抵以爲西洋人只會做機器——尤其是自鳴鐘——留學生只會講鬼子話，所以算不了「士」人的。因此他便來鏗鏘一下子，鏗鏘得吳汝綸也肯給他作序，這一序，別的生意也就源源而來了。¹⁸

如果我們不把魯迅所說的「生意」解作甚麼賺錢的事業，而把這段說話理解爲嚴復借助漂亮的古文來提高自己的地位，又從而提高自己對維新運動以至整個晚清政壇的影響，這段解釋便很合理了。毫無疑問，嚴復的譯文確是贏得了桐城古文大家吳汝綸的稱頌。在爲他的《天演論》所寫的序言裏，吳汝綸說：「文如幾道，可與言譯書矣。」又說：「嚴子一文之，而其書駸駸與晚周諸子相上下。」¹⁹ 這確是很高的評價，也使他聲名鵲起。從這個角度看，嚴復在翻譯中追求「雅」，也是出於政治的考慮了。

嚴復的翻譯中還有一個現象，也可以說是與政治有關的，那就是借用中國傳統中固有的詞句及概念來解釋一些外國思想中的新概念，例如他曾以《易經》及《春秋》來比附邏輯，以「內籀法」作歸納法，以「外籀法」作演繹法：

內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執其微以會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據公理以斷衆事者也，設定數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

17 王佐良《嚴復的用心》，頁26。

18 魯迅《關於翻譯的通信》，頁380-381。

19 吳汝綸《〈天演論〉序》，頁263。

之學也。遷所謂本隱之顯者，外籀也；所謂推見至隱者，內籀也，其言若詔之矣。二者即窮理之最要途術也。²⁰

類似的做法還有很多，下面再徵引一兩個例子：

夫西學之最為切實，而執其例可以御蕃變者，名、數、質、力四者之學是已。而吾《易》則名數以為經，質力以為緯，而合而名之曰《易》。²¹

竊謂其書〔《羣學肄言》〕實兼《大學》《中庸》精義，而出之以翔實，以格致誠正為治平根本矣。²²

謂計學創於斯密，此阿好之言也。……中國自三古以還，若《大學》、若《周官》、若《管子》、《孟子》、若《史記》之《平準書》、《貨殖列傳》、《漢書》之《食貨志》、桓寬之《鹽鐵論》、降至唐之杜佑、宋之王安石，雖未立本幹，循條發葉，不得謂於理財之義無所發明。²³

這樣的做法，有人解釋為嚴復沒有數典忘祖之弊，只是一面介紹西學，一面發揮國故。²⁴ 其實仔細看來，他這種做法也完全是出於政治的動機，心中仍是念念不忘那些多讀中國古書之人，一方面要向這樣的人解釋一些外國思想及概念，另一方面是使一些頑固派接受這些新思想。正如上文所說，這是當時很流行的做法。一位學者在解釋「達」的含義時便提出過這樣的論點：

嚴復同他的一些同時代的人一樣，認為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中的一些原理，同中國古人之理皆合，或可互相印證。如他以為牛頓動力之學，赫胥黎之天演說，皆合《易經》乾坤之義。因此，他自然得出了「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易」的結論。²⁵

這看來是另一類的「糖衣」吧。

嚴譯中最明顯表現它的政治動機的，就是嚴復經常加入不少按語，將原著的思想加以發揮，特別是聯繫到中國的情況上去。因此，很多人都說過，要理解嚴復的思想，一定不能忽視這些按語。舉例說，在《原富譯事例言》中，他便說過：

夫計學者，切而言之，則關於中國之貧富，遠而論之，則繫乎黃種之盛衰，故不佞每見斯密之言，於時事有關合者，或於己見有所根觸，輒為案論，丁寧反

20 嚴復《譯〈天演論〉自序》，頁 121。

21 同上注。

22 嚴復《譯餘贅語》，見《羣學肄言》，頁 2-3。

23 嚴復《譯事例言》，見《原富》，頁 1-2。

24 賀麟《嚴復的翻譯》，載《論嚴復與嚴譯名著》，頁 32。

25 沈蘇儒《論信、達、雅》，同注 16，頁 943。

覆，不自覺其言之長，而辭之激也。²⁶

在亞當·斯密這部著作的翻譯中，嚴復也下了大量的按語，討論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前途的問題；在翻譯孟德斯鳩的《法意》時，他也說：「其言往往中吾要害，見吾國所以不振之由，學者不可不留意也」。而他在裏面的按語更是深入探討了中國的法治問題，批評了中國封建專制統治下的黑暗。²⁷

自然，我們今天很容易便可以隨手找到很多例子，證明嚴復的翻譯不夠忠實。他對原著的大量改動，所作出的種種「經營」，往往過於大膽，時常肆意更改，也有根據他自己的判斷重新安排章節，而「所引喻設譬，多用己意更易」等，都是不符合我們今天對「忠實」的要求，也是嚴復的譯作最為人詬病之處。不過，在責備的同時，我們還應該探討其背後的原因，找出嚴復的動機。簡而言之，這些都是出於照顧讀者的做法。至於為甚麼他要這樣刻意照顧讀者，那就是因為政治的緣故了。有了政治的動機，為了符合政治的要求，「謹合原文與否，所不論也」。²⁸

1992年2月

26 嚴復《譯事例言》，見《原富》，頁1-2。

27 參王汝丰《嚴復思想試探——嚴復之翻譯及其思想之初步試探》，同上注，頁73-80。

28 嚴復《譯者自序》，見《名學淺說》，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年，頁1。